乌托邦产生前的阵痛：关于在澳大利亚建设一个国际性、高技术、持续发展城市计划的大辩论

楚天骄* 译

1 多功能城计划的前提

1987年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他们打算研究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未来城市——多功能城(MFP)的可能性，这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它将在澳大利亚国内外引起激烈的争论。本文概括了MFP的初始计划，考察了澳大利亚一个时期的激烈争论所引起的这一计划的一些变化，并且考虑了MFP引出的城市持续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本文还试图验证MFP给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带来的一些挑战。基于此，在MFP争论中，不同海滨之间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

4 总结和结论

本文考察了那种认为环境的改善会延续经济发展和造成较大失业的观点。在经济理论中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这是因为环保产品进入了个人的公用设施功能之中，环保产品数量的增加(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增加资源，象任何其它"一般"产品生产需要资源一样。这样，问题是配置的效率的问题，不是是否使用资源，而是把资源用到何处。由于地球不具备吸收生产和消费完成后的后果的无限能力，环保产品不能被认为是免费产品。社会必须为此目的配置资源；环保产品不再是免费的产品。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对关于市场和技术发明进行未来研究的一种重大挑战。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要找到一种把环保产品的贡献纳入个人的公用设施功能和社会福利之中的方法，这一步骤将有助于纠正这一错误观念，即为环境配置资源是浪费，因为它不为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任何东西。

本文列出的研究证据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一个地区环境的改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最终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经济活动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政府官员认识不到这一点将会由于在他们的辖区内在经济上浪费资源而付出极大代价。这是由于工人被吸引到给他们提供更好环境质量的地方，因而他们愿意以比较低的工资干工作。另外，更好的环境质量增强了人口的健康，这就导致了保健业上的节省，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率。虽然如此，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的生产在市场上是竞争的。因为某些部分环保产品是外在事物和公共产品，环保产品在这种竞争中需要得到政府的一些"帮助"。环保产品生产的增加对动态经济发展的纯后果取决于增强的投入生产率与被替代的投资生产率之间的平衡，而这取决于怎样改善环境，是通过使用掌握与控制方法还是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我们的证据说明在美国环境改善的纯后果是导致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发展。

节译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1995,5,27(5)

* 河南大学地理系

的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业可行性和政治信誉，同时，在 MFP 计划被公众接受的过程中，环境问题是一个关键主题。

初始的 MFP 强调它提供了城市发展的当前模式向新一代城市过渡的一种模式，这代城市力图用先进的生产、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及改善了的城市生活方式把城市与生物圈结合起来。MFP 计划一向特别强调创建一种把游憩、居住和工作完善结合在一起的城市生活方式。MFP 还力图把它与环境的关系确定为使其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最少，而不仅仅是改善退化了的土地。在技术领域，MFP 的目标是：利用目前工艺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和革新的、效率的客货运输方式提供服务，并把先进的制造业和维修工业集中在一起，同时对现存村落产生最小的负影响。MFP 的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统一的新住宅区。它试图以商品和服务的高增长、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高水平的社会平等来促进“生活的文艺复兴”。其核心是在 MFP 的中心地点建立一个国内外工人和居民融合在一起的国际环境，满足人们工作、生活和休闲消遣的各种需要。这个最初的构想实际上已有所改变，并非在基本方面，而是在为 MFP 做出的计划中的极端方面。

由于计划的发展，它已经对澳大利亚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性质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在城市规划方面，计划的国际性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地方规划者怎样理解他们的城市在一个日益国际化的产品、服务、最主要是普通资金资源和特殊技术革新市场中的作用。它还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主体发展怎样与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相一致，这些政治和社会压力是为了当地的持续发展，即尽可能地维持自然环境的完整。问题包括：现在的联合工业和居民的发展是否选择以前的分区制，集中的城市形式内部环境是否更好，以及怎样说服开发者和未来的居民相信这一选择，并且，在可持续发展城市中私人交通的作用是什么？在改变城市管理方面，工程中投资的国际性和把它作为国际作用模式的要求提出了谁将来管理这个新城市的实际问题。应该有一个分离的发展机构代表、投资者、政治家和社团、中央政府和州政府，还是应该成立一个拥有自己的当选成员和行政人员的新市政府？

2 环境问题和阿得雷德争论，1990—1991

把位于吉尔曼的 3460ha 环境退化了的土地选作 MFP 的地点，已引发了强烈的争论。很大部分归因于这一地点自身的性质。环境评论从多方纷踏而至。开始，MFP 官员被告知在吉尔曼保护红树的生态重要性，建议不干扰它们，并在该地实际划出保护范围，使红树地区成为 MFP 娱乐方面的组成部分。在建立红树保护带的计划这一问题上仍然引起了争论。按 MFP 的观点，面对由于“温室效应的增强”引起的海平面可能上升的问题，预计红树将会逐渐移入内陆，这将减少供 MFP 发展的空间。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认为如果海平面象预计的那样上升的话，MFP 的整个地方都会为洪水所吞噬。

吉尔曼也已处于工业区的包围之中，包括一座电站、几座汽油库、几座化学工厂（生产氨气、硫酸和铵）和一个大型橡胶弃置场。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有毒化学品泄漏事件，包括 1985 年 1,600kg 铜、铬和砷的泄漏事件。这些泄漏物汇入一个池塘系统，这个池塘系统也用于吸收来自暴雨雨水和泄漏物中的重金属，以防止对当地河系的直接污染（阿得雷德港地方环境保护组织，1990）。调查表明，阿得雷德港污水工程的排出物中大肠杆菌指标已是休闲用水推荐标准的三倍，是暴雨降落时水的推荐标准的 5,000 倍。这些过于暴露的营养物质促进了这一地区有毒海藻的繁盛生长（哈乌德，1991a）。所有这些严重影响着联接 MFP 所在地点湖渠系统计划。大气污染方面，吉尔曼周围的居民的癌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已高于阿得雷德的其他地区（阿得雷德港地方环境保护组织，1990），其中癌症死亡率比州平均水平高 75%。

鉴于这些当前问题，那么，吉尔曼是不是MFP的合适位置呢？它是否会加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呢？MFP计划确实有重新安排一些区内工业和翁菲尔德垃圾场的需要。这里仍有一些问题：是应该用搬迁工业来解决环境问题呢，还是用简单地撤换工业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发展联合工业呢，还是因工业的撤换而减少就业职位？而且，影响吉尔曼的主要污染问题来自邻近地区的工业而非当地工业。再者，就翁菲尔德而言，现在的地面污染和过去的有毒倾倒物的范围还未查明。在MFP地点选择问题发生以前，由州政府委托做出的一份报告断定，用正常标准来看，在吉尔曼地区发展住宅十分危险，每位居民都要作出全面的疏散计划（哈乌德，1991a）。从那以后，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多数评论者，包括在这些问题上最权威的当地机构——南澳大利亚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内，都断定在环境背景上吉尔曼的位置对MFP不合适。

在所有的公共争论中，环境方面已成为核心。MFP的设计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由一系列小村庄构成，每个村庄最大面积是600×600m²，包括围绕村庄广场建造的由住宅、市政厅和四层公寓组成的建筑物群，还有一系列人工湖、渠、开放空间和道路，以分隔和联系不同村庄。预计约50,000人在这里生活。开始房屋密度应相对较低，因为这是当前市场的需要。希望示范的生活条件和高密度的住房逐渐带动住房向更高密度发展，从而使土地增值。

房屋供应将由私人部门控制，而房屋设计是开发者的主要任务，尽管进行有益环境的房屋设计实验将会给开发者带来一定的压力。MFP很可能用20至30年进行开发，在开发过程中采用足够灵活的房屋设计方针，允许"组成器官"发生变化，以对兴趣和技术的变化做出反应。在最初阶段，预计它将用联系不同村庄的先进的，有益于环境的运输技术来表明它的发展。预计MFP内部的私人运输将采用新形式，这种新的运输形式将把汽车排除在外。

社会影响同样引起了大量争论，担心MFP将为一个受外国居民控制的技术政治领导创立一块飞地，无法与阿得雷德的生活主流相一致。另一方面，MFP要求为93,000人提供职位而仅为50,000人提供住房，这引起了人们对房屋价格不断上涨的忧虑。在这方面，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为了MFP的发展，建设的低价房屋较少，而阿得雷德港地区房屋价格的上涨将在当地社会产生一个转移影响，在阿得雷德这个已经最贫困的地区增添社会紧张和扩大两极分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即担心MFP将会把政府资金从阿得雷德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转移出来充作他用（MFP—阿得雷德公共咨询委员会，1991）。一些人进一步要求专用于MFP的全部资金最好应用于改善现存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支持当前的技术基础（凯斯摩，1991；MFP—阿得雷德公共咨询委员会，1991）。

所有这些问题的结果已在当地社会中形成某种混乱：一方面，多种形式的工作职位和提高了的环境标准受到人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人们对MFP地点的适宜性多有疑问，并且对它造成社会分裂的潜在倾向深有疑虑。一家地方社会组织感到吉尔曼不适于作为MFP的地点，这一看法很好地阐明了人们这些交织在一起的情绪，但不管怎样，MFP的发展确实为使该位置和该地区焕发新的活力提供了最好的前景（豪顿和弗莱士，1992）。

3 MFP的未来

在重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前提下，作为建立在假想基础之上的一个典型，MFP计划仍然缺少一个主要观点来解决在全球竞争环境不断变化和地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这三个部分怎样重组的问题。MFP系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文献，从希腊城市到E·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及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对MFP来说，探究古典设想和基础哲学没有什么意义：MFP不是霍华德或勒克布什的乌托邦城市的再现。恰恰相反，MFP工程经常与乌托邦城市的中心思想和中心原则相悖。它的支持者认为有必要修改计划以满足各个压力集

团问题的要求。MFP 实际上是在提供的公共基金的可能性有限的阶段，由实用主义者和苛刻的市场现实导致一个典型城市。作为在国际背景下处理城市规划问题的实例，MFP 也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MFP 有可能不只为城市设计和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典范，更主要是为城市管理的形式做出典范。

实际上，MFP 目前出现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它由私人部门控制的程度较大。尽管至今它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仍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但稳固地处在主导地位的仍是私人部门。为监督 MFP 的早期阶段实施而成立的 MFP—澳大利亚管理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位私人部门代表主持的，因为委员会中 50%的席位由私人部门占据，而地方联邦和社会界只各占一席。在最初计划中 MFP 不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地区，而应由州政府管辖，由它任命为管理 MFP 设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1991 年，临时管理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发展自治机关作为州政府的法定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它还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地方行政权威，包括那些靠近 MFP 地点的地方行政地区。同时建议在 MFP 地区成立一个公共顾问委员会。这三个部门的实际作用以及它们打算以何种方式一起工作还不清楚。在同等地位下，联合地方行政权威和公共顾问委员会是对立利益可能在决策过程边缘结合的典型实例，但是没有任何立法机构和财政机构能够在其自己的权限内真正做出决策或者保证他们的意见受 MFP 发展自治机关重视。

在 MFP 计划中还存在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它的成功。首先，关于投资和技术传递的数量和范围仍有疑问。早期的设想是 MFP 将吸引 80%的国外资金并受国外控制，同时最多吸引 5%的来自日本的技术，还有 95%的技术来自澳大利亚国内(哈乌德，1990)。第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预想的 MFP 的私人部门投资至今很少有实施的迹象。

第三，MFP 计划在促使城市设计在大范围和小范围内进行革新，同时又能提供安全投资可能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为获得成功，这项计划必须再做改动，这些改变还必须与能被澳大利亚群众和投资者普遍接受的传统的观点相一致。在 MFP 的一些目标中也有矛盾存在。例如，如果这一计划想要取得技术上的成功的话，它需要拥有众多的科学家，并且因为环境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结合，这些科学家中的大部分将会在当地生活，从而产生可怕的技术领导。第四，与此相关，人们担心 MFP 会带来社会不平等。最后，吉尔曼地点当前的环境退化继续引起人们关于它的适宜性的怀疑。毕竟，在积极方面，出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的考虑，引起了在城市持续发展领域进行的尝试，不仅仅是居住、工作和休闲机会的统一，不仅是城乡关系的统一，也不仅仅是象大多数澳大利亚当前城市中那样把满足发展汽车运输对道路空间的需求作为城市发展的明确特征。

不管成功的直接前景如何，MFP 很可能在将来城市发展的循环论证中继续激起争论。既已证明 MFP 对关于其一些方面的评论有所反应，因而这种争论可能会很有价值。另一方面，缺少主要观点和重要财政支持可能会使 MFP 严重地杂乱无章、漫无目标地发展，以至于难以对它的评论作出反应，失去实施过程中的方向辨别力。

节译自《Geography》，1995，79(1)，42—52